

中华文化在越南的建筑静态符号与节庆动态传承研究

谭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 要: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 文化同源、历史相关。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 中华文化通过制度植入、商贸往来和移民迁徙等多重路径深度融入越南社会, 并在建筑与节庆两个维度上形成了独特的传承景观。本文以越南著名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 从“静态符号”(建筑遗产)与“动态符号”(传统节庆)的比较视角出发, 系统分析中华文化在越南的移植、演变与在地化过程。研究发现, 以河内文庙、顺化皇城、会安会馆群为代表的建筑遗产如同“文化化石”, 凝固了中华礼制、皇权符号与民间信仰的空间叙事; 而以春节、中秋节为代表的节庆习俗则形成“活态基因”, 在代际传承中不断调适、创新, 形成了“根在中国、花在越南”的独特形态。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中越文化千年交融的完整图景。在当代语境下, 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正转化为中越文旅合作、遗产保护与文明互鉴的坚实基础, 为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关键词: 越南符号; 建筑遗产; 传统节庆; 中华文化传播

DOI: <https://doi.org/10.68249/jrtnla.2026.0006>

1. 引言

从翘角飞檐的建筑形制到灯笼油纸伞的民俗风情, 中华文化的印记深深镌刻于越南的文化景观之中。自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起, 至公元939年吴权自立^[1], 越南北部和中部在长达一千余年间处于中国行政管辖之下^[2]; 独立之后, 越南与中国历代王朝又维持了长达近千年的朝贡关系(968—1885年)^[3]。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中华文化通过制度植入、商贸往来和移民迁徙等多重路径深度渗入越南社会^[4]。

在思想层面, 儒家伦理中的仁、义、礼、智、信逐渐演变为越南社会的道德基石, 1075年科举制度被引入越南^[5], 开启其政治与教育“中国化”的关键一步, 在越南延续八百余载, 深刻塑造了其思想文化版图。在民间层面, 自16世纪起, 会安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明清时期大批中国移民南下定居, 兴建祠堂会馆, 将中华传统文化移植至越南社会。

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如何在越南通过不同形态得以延续成为关键问题。如果说建筑代表了凝固的历史符号, 那么源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则成为代际相传、不断演变的活态文化符号。这些节日不依赖固定的物质载体, 而是通过家族传承与民间习俗在越南延续、演变, 因地制宜。在保留核心文化精神的同时, 越南人民根据当地环境进行了创造性改进, 也形成了中华文化符合的本地化, 最终形成了“根在中国、花在越南”的独特文化形态。静态的建筑与动态的节庆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在越南的完整传承体系——建筑保存历史根基, 节庆承载当代活力, 充分诠释了中越两国千年深度交融与共生关系。

2. 中越交流研究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 中越两国于2026—2027年正式启动“中越旅游合作年”, 共同开发特色跨境旅游线路, 优化交通与服务保障, 为两国游客搭建便捷桥梁, 推动旅游合作互利共赢。2025年, 赴越中国游客达530万人次, 同比增长41.3%, 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国际客源市场; 双边贸易额达2960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二十余年来中国始终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6]。在经济贸易互联互通与人文交流双轮驱动下,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越南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文化印记, 可为跨境文旅线路设计、文化遗产阐释与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学理支撑, 助力“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深度融合。

本研究提出“静态符号-动态符号”的分析框架, 将物质文化遗产(建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纳入统一的比较视野, 有助于深化对文化移植、在地化与延续机制的理论认识, 为东亚文化圈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 在理论上可以丰富跨文化传播与遗产研究。

作者简介: 谭勇(1981—), 男,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研究、语言服务及ESP教学;

通讯作者: 谭勇, 西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商务英语系, 邮箱: tyswfc@126.com

另外，中越两国已开展多项联合考古项目，在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携手守护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古老文明在交流中焕发新生，巩固文化互信的根基。积极推进“中越经典著作互译出版项目”，加强教育与青年互访交流，在思想共鸣中深化相互理解，以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本研究可为这些合作实践提供历史依据与文化阐释，在现实意义上推动从“文化遗产保护”到“文明互鉴”的层次提升。

3. 研究方法 with 路径

静态符号（建筑化石）是以物理空间为载体、形态相对固定的文化遗产。本文特指越南境内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古建筑群，包括礼制建筑（文庙）、皇权建筑（皇城）、民间信仰建筑（会馆、庙宇）等；其特征是空间叙事性强、形制稳定性高、与制度体系紧密绑定，如同“文化化石”般凝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明信息。而动态符号（节庆活态）以时间节律为载体、在传承中持续演变的文化实践。本文特指越南境内源于中国并在当地发展演化的传统节日与民俗活动，包括春节、中秋节及相关民间信仰仪式；其特征是形态流动性强、社群参与性高、自我更新能力突出，如同“活态基因”般在代际传递中不断适应新环境。

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选取河内文庙、顺化皇城、会安会馆群作为静态符号的典型案例，选取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作为动态符号的典型案例，通过多维比较揭示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

4. 中华文化南传越南的双重路径

4.1 制度性传播：郡县与朝贡体系的制度遗绪（自上而下）

自公元前 111 年至公元 939 年，越南北部及中部处于中国郡县管辖之下，中原王朝通过郡县制度、律法体系与教育模式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因嵌入越南社会结构^[7]。独立后的越南历代王朝以“小中华”自居，在朝贡框架下持续吸收中国的典章制度、儒家思想与历法术数。科举制度于 1075 年引入越南，延续 844 年至 1919 年废除，成为世界上最后废除科举制度的国家，将儒家价值观深度植入越南知识阶层的思想结构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制度在越南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印记，并在当代以新的形式延续。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度是一种以户为单位、连保互察的基层治安与户籍管理制度，其核心在于通过邻里监督实现对人口流动的有效控制。这一制度随郡县统治传入越南，成为古代越南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代越南，外国人住宿申报制度要求所有在越南住宿的外国人，其接待方必须在 24 小时内向当地公安机关申报住宿信息。这一制度在功能逻辑上与古代保甲制一脉相承：均以人口管控为核心目标，强调基层单位的报告责任，通过信息登记实现对流动人口的掌握。虽然当代制度在形式上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产物，但其深层文化逻辑“以户管人、以邻互察”可追溯至中国古代保甲传统在越南的制度化移植。该案例生动说明制度性传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显性的政治架构中，更潜藏于日常治理的微观机制之内。

4.2 民间性传播：商贸与移民网络（自下而上）

自 16 世纪起，会安崛起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被誉为“大东洋港”。来自中国、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商船云集于此，带来了丝绸、瓷器、茶叶与香料的流通，也带来了人员的往来与文化的碰撞。中国商人在会安建立商馆、定居贸易，形成了早期的华人社群。商贸活动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建筑风格随商人传入，饮食习惯随货物交流，信仰习俗随社群定居而扎根。

明清鼎革之际，大批不愿臣服于清朝的明遗民南渡越南，其中不乏士人、官员、工匠与商人^[8]。越南阮氏政权对这些移民采取包容政策，允许他们在南部开垦定居、保留习俗、建立社群。移民们兴建祠堂以祭祖敬宗，建造会馆以联络乡谊，设立庙宇以供奉故土神祇。这些建筑不仅是信仰空间，更是文化认同的堡垒，将中华文化完整移植至越南社会。福建、广东、潮州等地的移民分别建立各自的会馆，形成了“五帮”并立的社群格局，使岭南建筑风格、闽南信仰体系、客家宗族观念在越南落地生根。

4.3 双重路径的交互作用

如果说制度性传播是“自上而下”的文化输入，那么民间性传播则是“自下而上”的文化扎根。贸易搭建了经济交流的桥梁，移民完成了文化传承的接力。民间力量是中越文化融合的无形纽带，将中华元素编织进越南的社会肌理，共同绘就了一幅多元共生的文化图景。

同时，制度性传播为文化移植提供了“合法性框架”，即通过官方教育、科举考试、律法制度，确立了儒家价值观的正统地位；民间性传播则完成了文化的“生活化扎根”，即通过商贸网络、移民社群、宗族组织，将中华文化融入越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二者并非割裂，而是相互强化：制度确立了文化尊崇的地位，民间实践赋予文化以生命力；民间需求推动制度的调适，制度保障又为民间传承提供稳定环境。正是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

双重机制，确保了中华文化在越南的深度渗透与持久延续。

5. 静态符号：凝固历史的建筑基因

历史建筑与静态符号之间本质上是“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涵”的相互映射，是“体”与“用”、“源”与“流”的关系。历史建筑是凝固的、立体的静态符号，而静态符号则是历史建筑被抽象化、扁平化后的文化基因。建筑通过砖石、木构、色彩将抽象的文化观念（如皇权至上、天人合一、宗法礼制）转化为可见的具象化静态符号；而静态符号带有强烈的地域在地化和时代烙印的特征，从而构成了建筑的视觉识别系统，并承载着比建筑本身更深厚的隐喻，形成历时性演变和共时性解读。

5.1 礼制空间的移植：河内文庙（Văn Miếu Hà Nội）

河内文庙建于 1070 年，是越南第一所高等学府，象征着越南历史上儒教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巅峰。其布局严格遵循中国儒家庙宇的规制，以清晰的南北中轴线贯穿，殿堂院落层次分明，体现了“礼”的秩序与等级。

文庙内的进士题名碑是珍贵的人类记忆遗产。82 座石碑以龟趺为座，刻写着 1300 余名科举进士的姓名与事迹，碑文均以古典汉字书写；2010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的永恒见证。文庙不仅是文化融合的象征，更是两国深厚历史纽带的生动体现，九百年来一直是知识交流的灯塔。

5.2 皇权符号的镜像：顺化皇城（Hoàng thành Huế）

顺化皇城作为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的首都，于 1993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9]。它是越南皇家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完整保存了一个封建王朝首都的规划与建筑精髓。

其整体规划与建筑风格借鉴了北京紫禁城。不仅确立了南北中轴线的核心布局，更采用了午门、太和殿等宫殿名称。标志性的黄色琉璃瓦与翘角飞檐，充分彰显了中国皇家建筑的庄严与威仪。城内所有匾额与碑刻均以古典汉字书写，深刻反映了阮朝急于通过彰显“中华正统”来确立其皇权合法性与文化正统地位的诉求。

皇城布局严谨有序，体现了儒家“礼”的核心理想与等级秩序。这一设计逻辑与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一脉相承，使物理空间成为承载儒家“五常”精神的文化容器。

5.3 民间信仰的载体：会安会馆群（Quần thể Hội quán Hội An）

会安古城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里保存了大量由各省中国移民建造的会馆，它们不仅是同乡聚会之所，更是文化认同的堡垒。

福建会馆（天后宫）与广肇会馆是其中建造最为精美、装饰最为华丽的代表，成为会安多元文化融合的经典见证。漫步会安古街，几乎每座历史建筑上都可见褪色的汉字匾额与楹联。这些镌刻的文字超越时空，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如何深度融入会安的当地生活，成为古城独特魅力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广肇会馆是岭南建筑风格的经典范例，建于 1894 年，既是广府后裔的宗祠，也是供奉关公与妈祖的庙宇，体现了华人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丰富历史。其精美的“五福”雕刻装饰是华人神祇供奉场所的典型特征，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连接两族信仰与审美情趣的桥梁。

表一 越南中华风格建筑静态符号特征

序号	特征维度	具体表现
1	形态稳定性	建筑形制、材料工艺、装饰纹样相对固化，数百年保持原貌
2	空间叙事性	通过中轴布局、匾额楹联、雕刻彩绘传递文化信息
3	制度依附性	与科举、皇权、宗族制度紧密绑定，制度消亡则功能弱化
4	保存依赖性	需要物质性维护与修复，易受战争、灾害、城市化威胁
5	认同象征性	成为国家文化遗产标志，承载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

静态符号如同“文化化石”，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明信息凝固于砖石木瓦之中。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却也是被动的保存者——其价值依赖于后世的认知、保护与阐释。

6. 动态符号：时间流动中的节庆演变

6.1 春节（Tết Nguyên Đán，简称 Tết）：从“中国年”到“越南年”

越南春节全面继承了中国春节的核心精神：家庭团圆、辞旧迎新。祭灶神、贴春联、除夕守岁等传统习俗得以完整保留，构建了东亚文化圈共通的情感纽带，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历经千年传承，春节已与越南农耕文化深度融合。制作方粽成为独特习俗——以糯米包裹绿豆猪肉，外裹竹叶，是越南春节祭祀与家庭团聚的核心

节令食品，象征丰收与来年的美好祝愿。桃花与金橘树取代中国传统年花，成为广受欢迎的装饰。金橘盆栽果实累累，是越南新年的标志性装饰。在谐音文化中，“橘”寓“吉”，金色果实象征财富与祝福，成为迎新必备。

每一代越南人在家庭聚会与庆祝中，都为这份文化遗产注入新的内涵。

表二 越南春节“活态化”演化

序号	特征维度	具体表现
1	食物系统的农耕化重构	方粽的方形象征大地、绿色粽叶象征生机，与越南热带稻作环境深度绑定；对比中国饺子/年糕的温带适应性
2	装饰符号的生态化替代	桃花替代梅花（物候匹配）、金橘谐音“吉”、“五果盘”的越南独创
3		受法国殖民时期“双历制”的影响、越南“小年”到“大年”更绵长的仪式周期与热带农闲周期关联
4	社会功能的代际更新	从“家族节日”扩展为“民族节日”（国家法定假日、领导人贺词）；城市化催生“春运”、电子红包等新元素

6.2 中秋节（Tết Trung Thu；也称 Tết Thiếu Nhi）：从“赏月思乡”到“儿童节”

越南中秋节源于中国古代祭月祈福的传统，保留了提灯笼游行、家庭聚会等核心活动，是东亚文化圈共有的节日记忆，承载着传统中华文化的深刻印记。然而，受当地社会风俗影响，节日逐渐摒弃了“赏月思乡”的感伤情调，演变为全国性的儿童节日。习俗通过亲子活动口头传承，形式灵活多变，是典型的动态文化符号，反映了文化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色彩斑斓的手工竹灯笼给越南儿童带来欢乐，是流动文化最温暖的物质呈现。

表三 越南中秋节“活态化”演化

序号	特征维度	具体表现
1	儿童化“演变”的社会根源	秋收后新学年开始的时点关联、越南“重子嗣、望成才”的生育文化、从“感伤思乡”到“欢乐育儿”的情感重构
2	灯笼工艺的本土化创新	从模仿中国宫灯到发展“竹编动物造型灯笼”；竹资源利用使工艺从专业工匠转向全民手工；当代 LED 电子灯笼与传统竹编并存
3	口头传承与社群互动	母亲教做灯笼、祖母讲嫦娥越南版（Hàng Nga）、社区提灯游行——“去制度化”传承的微观机制

6.3 清明节（Tết Thanh Minh）：从“祭祀祖先”到“爱国精神”

越南清明节在保留“饮水思源”、缅怀先人核心精神的同时，融入了丰富的本土文化记忆。在从中国传入的介子推传说基础上，越南还结合了自身的龙仙和二征娘历史神话，前者是越南人将清明节与祖先龙仙夫妇（貉龙君与瓠姬）联系起来以制作一百个汤圆象征其繁衍的百卵来祭祀民族起源，而后者将汤圆与越南两位女民族英雄（二征娘）出征前获赠汤圆、战死后百姓以汤圆祭奠的悲壮故事相融合从而赋予越南清明节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且越南的清明扫墓并不严格限定在当天，人们通常会在清明节气前后的 14 至 15 天内灵活选择^[10]。

表四 越南清明节“活态化”演化

序号	特征维度	具体表现
1	本土人物的融入	由中国寒食纪念介子推移植到越南“祖先龙仙夫妇（貉龙君与瓠姬）”的创世神话的强化，清明与寒食合并：越南将清明节与寒食节结合，统一在农历三月初三。除了常规的香烛酒肉，常以越南家庭传统的黑糯米饭（由糯米与乌稔树叶混合炊煮）作为重要供品，这曾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食物，如今成为连接家族历史的重要纽带。
	食物的移植	从象征创世神话繁衍的百卵到节庆食物的一百个汤圆，因此清明节在越南又被称为“汤圆节”。这一天家家户户会制作绿豆汤圆（Bánh chay）和红糖汤圆（Bánh trôi）等凉食，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象征着生命的圆满与纯

3	南北地域功能的分化	洁
		越南北部清明节的祭祖氛围依然浓厚；由于南部地区春节已进行过大规模祭祖，清明节逐渐演变为以踏青游玩、亲近自然为主的休闲节日

6.4 民间信仰与婚俗的延续

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妈祖、关公崇拜已与越南祖先崇拜深度融合。例如，越南南部妈祖庙每年举行的“迎妈祖回宫”仪式，历经数代调整仪式细节，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发展的生动证据。越南传统婚礼深受中国“六礼”影响，完整程序注重吉兆。从提亲到婚礼，各环节均继承中国传统礼仪的核心精神，体现了中越文化在民间礼仪中的和谐融合。

表五 越南中华节日动态符号特征

序号	特征维度	具体表现
1	形态流动性	习俗内容、庆祝形式随时代环境持续调整
2	时间节律性	以年度周期为框架，嵌入日常生活节奏
3	社群参与性	依赖集体记忆、代际口传与社区互动
4	自我更新性	保留核心精神的同时主动适应新环境
5	情感表达性	承载个人与集体的情感需求，具有即时生命力

动态符号如同“活态基因”，不依赖固定载体，而是通过人的行为、情感与记忆在时间长河中流淌。它们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其变异性——在保留核心文化精神的同时，不断与当地环境对话，生成新的文化形态。

7.讨论：从文化遗产到文明互鉴

7.1 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路径

中越两国已开展多项联合考古项目，在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携手守护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顺化皇城的修复、文庙碑刻的保护、会安古城的维护，都需要两国专家的协作。静态符号的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认同的维系——每一块琉璃瓦的复原、每一幅楹联的辨识，都是对共同历史记忆的确认。

7.2 文旅融合的创新实践

2026—2027“中越旅游合作年”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契机。基于静态符号的“建筑遗产游”与基于动态符号的“节庆体验游”可形成互补产品：如古建筑线路（河内文庙-顺化皇城-会安古城，解读中华礼制与皇权的越南镜像）、节庆线路（春节方粽制作体验、中秋灯笼工坊、妈祖祭典观摩，感受活态文化的当代脉搏）、跨境同构线路（北京紫禁城-曲阜孔庙-河内文庙-顺化皇城，构建“中华礼制建筑走廊”）。

2025 年数据显示，中国成为越南最大国际客源市场；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1]。在经济贸易互联互通与人文交流双轮驱动下，文旅合作已成为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

7.3 文明互鉴的理论启示

越南的文化遗产生动诠释了“礼失求诸野”的古老命题，即当某些传统建筑形制与礼俗在中国本土因历史变迁而改变时，它们在越南却以相对完整的形式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活化石”。

然而，这一命题在当代需要新的阐释：不再是单向的“输出-保存”关系，而是双向的“互鉴-共创”关系。越南对春节、中秋的本土化改造，对建筑形制的适应性调整，本身就是文化创造力的体现。中越文化交流的未来，应超越“谁影响谁”的线性叙事，转向“共同守护、共同创新”的文明互鉴新范式。

8.结论：

8.1 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静态符号-动态符号”的比较框架，系统分析了中华文化在越南的传承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华文化对越南的影响早已超越单一领域。从宏伟的建筑形制到思想塑造的文字语言，从立身处世的哲学思想到规范社会的制度体系，再到深入民间的信仰习俗、口耳相传的传统工艺与岁时节庆，中华文明的印记

无处不在。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模仿，而是融入民族文化血脉的深层印记。

第二，静态符号（建筑遗产）与动态符号（传统节庆）构成了文化遗产的两种互补形态。建筑如同“文化化石”，凝固了历史原貌，保留了中华文化的源头；节庆如同“活态基因”，贯穿日常生活，实现了文化的活态传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越文化千年交融的完整图景。

第三，共享的文化基因构建了中越两国人民天然的亲近感与认同感。这种超越时空的文化共通性使双方产生情感共鸣，成为民心相通、友好交往的坚实基础。

第四，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渊源并未褪色，反而转化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为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建命运共同体注入不竭的文化养分。

8.2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依赖文献分析与典型案例比较，未来可结合田野调查、口述史访谈等方法，深入探究节庆传承的微观机制。此外，数字化保护技术（如三维扫描、虚拟现实）为静态符号的保存与展示提供了新路径，值得进一步关注，为建设“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陈重金. 越南通史[M]. 戴可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 [2] 郭振铎, 张笑梅. 越南通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3] 覃雪源. 民族心理因素对中越两国外交行为的影响(1950-1978) [J]. 传承, 2010 (03): 76-77+168.
- [4] 贺圣达. 东南亚文化发展史[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 [5] 王士录. 越南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J]. 东南亚, 1994(3): 52-58.
- [6] 聂宇欣. 智慧共筑, 命运与共——携手迈向“一带一路”新征程——第十五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综述[J]. 东南亚纵横, 2023 (06): 53-60.
- [7] 范红海. 儒家文化在越南的跨文化传播——以越南文庙为例[D]. 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2018.5.
- [8] 平兆龙. 科名传世：越南明乡人百年科举考论（1819—1919）[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24 (01): 83-94.
- [9] 陈秋草. 基于游客和居民感知的越南文化遗产旅游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2019.12.
- [10] 陈丽琴. 中越清明节传说及节俗之比较[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4): 75-80.
- [11] 越南国家统计局. 2025 年越南旅游业统计报告[R]. 河内, 2026.

On Chinese Culture's Static Symbol in Architectural Fossils and Dynamic Inheritance of Festivals in Vietnam

Tan Yo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International College),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China and Vietnam are connect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 the same 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long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culture has been deeply integrated into Vietnamese society through multiple paths, such as system implantation, business contacts and migration, and has formed a unique inheritance landscape in two dimensions of architecture and festivals. Taking the famous cultural heritage of Vietna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transplanting, evolu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a culture in Vietnam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f “static symbols”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nd “dynamic symbols” (traditional festivals). It is found that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presented by the Confucian Temple in Hanoi, the Imperial City in Hue and the

Hui'an Guild Hall Group is like a “cultural fossil”, which solidifies the spatial narrative of Chinese etiquette, imperial power symbols and folk beliefs. The festival customs represented by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Mid-Autumn Festival form a “living gene”, which is constantly adjusted and innovated i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forming a unique form of “rooted in China and spent in Viet Nam”.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ogether form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Millennium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Vietnamese cultures.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i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 i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ino-Vietnamese cultural tourism coopera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which provides profound cultural nourishment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destiny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Keywords: Vietnamese symbo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festivals; Inheritance of Chinese culture